

第一編

先秦至南朝時期：
發軔



第一章

從文明初開到漸入華夏



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嶺南自史前至南朝的歷史發展脈絡逐漸清晰。該地區適宜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物質資源為“磨刀山人”“馬壩人”等早期人類活動提供了物質條件和基礎。考古學上的連續文化層揭示了從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發展序列，展現了先秦時期嶺南人類社會自身發展及其與長江流域文化接觸並受影響的演化軌跡。秦朝的統一與郡縣制的推行，標誌著中原王朝制度在嶺南的確立，同時也開啟了漢越文化融合的新紀元。南越國的興衰，漢至六朝嶺南郡縣制的推廣與地方豪族、蠻酋的興替，進一步反映了中央與地方、漢文化與越文化之間的動態關係。

第一節

早期嶺南文明探源

嶺南，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孕育了豐富多彩的史前文明。北江、西江水系的形成，為古人類提供了繁衍生息的环境。舊石器時代的早期人類活動在這裏留下了深刻印記。磨刀山遺址的文化面貌展現了鮮明的與長江流域文化迥異的文化特徵，馬壩人化石的發現則為研究早期人類體質形態的演化提供了珍貴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嶺南地區的文化面貌逐漸豐富。鹹頭嶺文化、古椰文化和石峽文化從不同層面展示了嶺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進入夏商周時期，嶺南的文化發展與中原的聯繫更加緊密。早期嶺南文明完整的歷史為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堅實的證據。

一、粵從何來？

地質研究表明，廣東北江、西江水系在新近紀初期形成。新近紀中期至早更新世，陸地廣泛出現。約在距今 55 萬年前，海水沿西江及其支流上溯，影響範圍至今肇慶四會及其以北。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因地殼抬升，各地形成二級階地。進入晚更新世中期，海進主導地理環境演變，中部三角洲環境漸成，整體氣候較為溫暖濕潤，適宜動植物生長。這些都為嶺南古人類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條件。

目前所知，廣東最早的人類活動可以上溯至中更新世偏早階段，即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 80 萬-60 萬年。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西江支流的南江盆地東北部，從四級階地延伸至二級階地，且大部分活動地點分佈在 20 平方千米的密集區域內。郁南磨刀山遺址南江舊石器地點群的年代跨度從中更新世一直延

續至晚更新世，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文化發展序列，涵蓋舊石器時代早期至晚期。值得注意的是，磨刀山遺址的石器技術具有華南地區礫石石器工業的一般特徵，與長江流域湖南等地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具有某些相同的時代特徵，但與廣西百色盆地以及東南亞地區的舊石器早期文化相比，具有更多同質性。^① 這表明廣東早期人類為適應亞熱帶—熱帶氣候環境作出了具有偏好性的選擇。

不過，磨刀山遺址並未發現人類化石，所以馬壩人化石作為目前廣東唯一發現的早期智人頭骨化石，對於研究廣東早期人類體質形態的演化仍具有重要意義。廣東目前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包括雲浮蟠龍洞人（距今約 20 萬年）、曲江馬壩人（距今 13 萬年左右）以及封開羅沙岩人（距今 7.9 萬年），初步勾勒出廣東地區早期智人的演化進程。

根據基因學的研究，距今 4 萬年前後，被稱為“澳美人種”（Australo-Melanesians）的人群通過印度洋沿岸到達東南亞大陸的南部邊緣，其後逐漸北進。^② 嶺南的考古學發現（特別是屈肢葬）為上述觀點提供了支持。在廣東、廣西的洞穴遺址中，發現大量距今約 2 萬年的屈肢葬遺跡。這種葬俗一直持續至距今約 6000 年前的鹹頭嶺文化時期。同一時期，東南亞地區普遍存在屈肢葬的葬俗。根據觀察對比，這些古人的個頭不大，在體質特徵上與蒙古人種有明顯差別。廣西婭懷洞遺址出土的人骨材料和廣東青塘遺址發現的“青塘少女”遺骸都體現了這些特徵。

在大約 3 萬—1 萬年前，華北地區經歷了從細石器傳統的採集、狩獵模式向農業模式的轉變。華南地區的古人類則維持著比較富饒的漁獵生活。考古學者在華南的古人類遺址發現了大量的動物骨骼，包括齧齒類動物，這表明華南古人類的食譜相當廣泛。此外，華南地區石器屬礫石石器，與華北地區的細石器傳統形成了鮮明對比。

距今約 10 000—8000 年，南嶺南北兩側出現顯著的文化差異。位於嶺北的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發現令人矚目，該遺址早期就出現了發達的稻作農業

①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雲浮市博物館、郁南縣博物館：《廣東郁南縣磨刀山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17 年第 5 期。

② 澳美人種是“非洲老祖母”的後代走出非洲後的一支，個子不高、皮膚較黑、大眼睛、雙眼皮，接近現代赤道附近的土著人。



馬壩人頭骨（複製品）

1958年發現於廣東曲江馬壩，是一具不完整的頭骨化石，可能屬於一名男性中年個體。作為嶺南發現的最早人類之一，馬壩人的發現擴大了我國早期智人的分佈範圍，填補了華南人類進化系統上的空白。

·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距今約 8000 年)。相近時期的廣西則有甌皮岩洞穴遺址(距今 12 000-7000 年)和頂嶺山遺址(距今約 10 000-6000 年)。後者是一個貝丘遺址,陶器形狀比初始階段複雜,且普遍裝飾有繩紋,葬俗以各種類型的屈肢葬為主。廣東雷州半島的遂溪鯉魚墩遺址一期、二期與頂嶺山遺址具有密切聯繫。^①考慮到頂嶺山遺址的特徵以及廣東後續發現的遺址情況,可以推斷這個時期整個廣東的遺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與頂嶺山遺址有相似之處。

二、鹹頭嶺文化、古椰文化與石峽文化

距今 7000-6000 年,鹹頭嶺遺址成為嶺南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文化高地”。鹹頭嶺遺址第一期出土的白陶和彩陶引人注目,其部分文化因素來自湖南高廟遺址。在環珠江口的眾多同期遺址中也發現了白陶和彩陶。來自沅江中上游和湘江中下游地區的白陶與彩陶傳統明確表明洞庭湖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對環珠江口區域產生了影響。^②在肇慶的蜆殼洲遺址,除了發現鹹頭嶺文化類型的彩陶外,還發掘出大量屈肢葬的人骨(包括側身屈肢葬、仰身屈肢葬、蹲踞葬),說明嶺南先民在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同時仍維繫著原有的文化傳統。總體而言,鹹頭嶺文化表明,從這個時期開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社會發展進程開始受到長江中下游文化發達地區的影響。

鹹頭嶺文化遺址分為沙丘遺址和貝丘遺址兩種,遺址的面積普遍不大,人口規模偏小,主要以漁獵、採集為生,而且尚未發現其接受原始稻作農業和馴養動物的證據。同時期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大量出現稻作文化遺址,在嶺南目前還沒有發現類似情況。

在大約 8000-7000 年前,長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區域和江漢平原成為文明發展的中心之一。自距今 7000 年左右的河姆渡文化開始,長江下游地區的稻作文明逐漸發展壯大。到崧澤—良渚文化階段,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環太湖平原成為中國南方社會發展的“領頭羊”。距今 6000-5000 年的佛山高明古椰貝丘

①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館、遂溪縣博物館：《廣東遂溪鯉魚墩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5 年第 7 期。

②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編著《深圳鹹頭嶺 2006 年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3，第 256-274 頁；廣東省文物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溯本求源：廣東重要考古發現概覽》，科學出版社，2021，第 33-39、41-42 頁。

遺址除了發掘出土的一些陶器受到湘西南古人類遺址的文化因素的影響外，還有數件與環太湖地區馬家浜文化類似的腰沿釜、具有崧澤文化特徵的陶豆以及具有良渚文化早期特徵的圈足罐，說明這一時期的嶺南在長江中下游文明的持續影響下出現了歷史的轉變。

古椰文化階段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對西樵山的開發。西樵山被譽為“珠江文明的燈塔”，其主要石器類型是雙肩石器和細石器傳統的石葉、石核。^① 雙肩石器受到廣西的影響，這種石器大舉進入廣東的原因是當地人群對石器的龐大需求。廣東與古椰貝丘遺址同期的遺址還有不少，這意味著當時人口規模和社會單位增長，勞動工具需求量相應增加。西樵山的石器主要用於加工木頭和竹子，而不是直接用於農耕作業。這應該與當時先民建造竹木房子以及製作舟、筏等竹木交通工具密切相關。

古椰貝丘遺址位於珠江三角洲地區，遺址中發現大量植物遺存，包括果核、竹木片、樹葉、植物果實等，還有一些動物遺骨，如豬脊骨、鱉殼等。然而，目前尚未發現人工栽培稻遺存的確鑿證據。古椰遺址的植物遺存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人類社會在稻作農業進入前的植物性食物種類提供了線索。^② 嶺南史前文化的面貌和人們的生計方式呈現出豐富的多樣性。

在距今 5000—4700 年的嶺南考古遺址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廣州從化橫嶺遺址，即橫嶺類型。橫嶺遺址出土的陶器反映了長江下游地區崧澤—良渚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影響，其中尤以圈足罐及帶羊角把的容器為代表。^③ 橫嶺類型出現了影響整個東南和華南的文化因素——拍印的幾何印紋。這說明它可能是中國東南地區的幾何印紋陶與原始瓷文化區的源頭之一。從這一時期開始，幾何印紋陶在廣東逐漸被發揚光大，並出現了高溫泥質陶器。高溫泥質陶器的出現表明當時人們能夠穩定掌控窯爐溫度，是製陶工藝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到了石峽文化階段，嶺南文化多元化的特點越發明顯。橫嶺類型向東發展演化為虎頭埔文化，成為廣東在考古學文化面貌上具有強烈地方特色的文化類

① 曾騏：《珠江文明的燈塔：南海西樵山古遺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第 41—107 頁；廣東省文物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溯本求源：廣東重要考古發現概覽》，科學出版社，2021，第 51—5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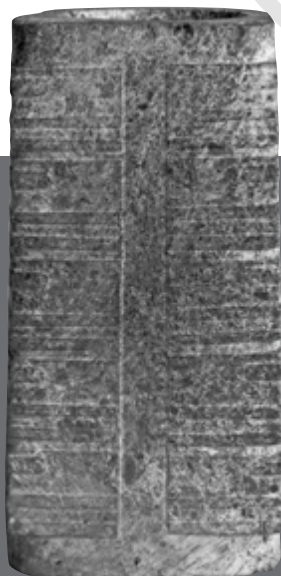
② 楊曉燕、李昭、王維維、崔勇：《稻作南傳：嶺南稻作農業肇始的年代及人類社會的生計模式背景》，《文博學刊》2018 年第 1 期。

③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廣東從化橫嶺遺址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簡報》，《文博學刊》2022 年第 4 期。

古椰遺址航拍圖

位於廣東佛山高明區。遺址發掘出土的遺物種類豐富，包括石器、陶器、木器等人工製品和大量動植物遺存，為研究這一時期珠江三角洲乃至嶺南地區史前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古生態環境及海岸線的變化等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新石器時代玉琮

出土於石峽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玉琮，內圓外方，四面平直，由五節組成，每一節以方角為中軸刻出一組簡化人面紋。這件玉琮在形制上與良渚文化的玉琮相似，但從用料和其他差異來看，仍有本地文化的特點。

· 廣東省博物館（廣州魯迅紀念館）藏

型，主要分佈在粵東、粵東北的部分地區。與此同時，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幾何印紋陶是另一種風貌，與虎頭埔文化有所區別。而粵北地區的石峽文化風貌則又與前兩者有所不同。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提出“區系文化類型”的概念^①，廣東學者以朱非素為代表，通過考古實踐，逐漸將廣東劃分為珠三角、粵東、粵北、粵西和雷州半島五大區塊，進一步展現了廣東多元文化面貌^②。

石峽文化的陶器除了具有本地因素外，還直接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如盤形鼎、貫耳壺等器型，儘管數量有限，但權重大，與玉器同理。^③在石峽文化的歷史時期，其主流文化全面接受了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不僅在石峽遺址，在英德岩山寨遺址也出土了琮、鉞等良渚文化玉器。以禮玉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其影響已擴展至廣州東北部，這一點可從黃埔茶嶺遺址和甘草嶺遺址中看出端倪。

近十年來，考古學者對石峽文化的一些地點（和平等地）的浮選和檢測表明，石峽文化的作物結構是稻子加粟（小米），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則是單純地栽培稻子。因此，從作物的種類來看，石峽文化的農業與良渚文化基本沒有關係；而與長江中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的農業更為類似，如屈家嶺文化等，這些考古學文化農業種植的作物同樣為稻子和粟。由此推斷，石峽文化的農業來源於長江中游地區的同期考古學文化。

總體而言，嶺南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歷史文化始於對長江中游文化因素的吸收與學習，隨著時間的推移，嶺南文化與歷史發展逐漸與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文明進程同步。

三、嶺南的“夏商周”

探討嶺南夏商周三代的起始，須從廣東確認夏紀年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開始。夏紀年從絕對年代上距今大約 4100-3600 年，嶺南夏紀年的代表性遺存是石峽遺址第三期。總體而言，在夏紀年的時間段內，嶺南地區再次受到來自長

① 蘇秉琦、殷璋璋：《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

② 朱非素：《嶺外求真：朱非素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2015，第10頁。

③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年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4。

江中下游地區的重大影響，形成了以幾何印紋陶和原始瓷為代表的文化區。嶺南延續並進一步發揚其原有的幾何印紋陶傳統。幾何印紋陶與原始瓷一起形成了百越文化圈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

在夏紀年晚期或夏商之際，玉石禮器的影響源發生變化。源自中原地區的牙璋等禮器通過長江中游進入嶺南。牙璋最早出現於山東龍山文化，隨後在二里頭文化中大量出現，而且在四川三星堆以及廣東、廣西、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發現，其分佈範圍很廣。牙璋進入南方地區的意義重大。以東莞村頭遺址為例，牙璋本地化現象尤為明顯，除了玉石材質牙璋外，還有數量較多的石質、骨質、角質牙璋。夏商之際，牙璋的傳入及其思想意識的普及，是嶺南“大變局”前醞釀階段的特徵。不過，嶺南的夏紀年並未完全按照中原地區的發展脈絡演進，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按照自己的慣性發展。

從夏紀年到早中商階段，廣東的文化遺址分佈範圍進一步擴大。其中，東莞村頭文化的分佈範圍從粵北向西一直到西江幹流兩岸，向南一直波及珠江口。其影響範圍向西擴至南寧以東，向西北則已經進入湖南南部和廣西東北部。例如，湖南靖州門篷坡遺址明顯受到村頭文化的影響，桂林全州一帶的遺址也出土了具有村頭文化風格的器物。粵東地區則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後山類型。從考古學文化譜系的角度來看，後山類型在陶器技術上繼承了虎頭埔文化的高溫陶器，但是在器物上並沒有表現出與虎頭埔文化有更多聯繫，二者只存在鬆散的承襲關係。石峽文化的器物器型在這個時期幾乎消失了。在生產技術方面，廣東繼續取得進步，如原始瓷的製造。梅州平遠縣水口窯的陶器燒製溫度更高，表面有類似釉的褐色斑點，其中一些可能是有意局部施加的。這符合原始瓷技術發展的邏輯。可以說，這是嶺南本土文化因素進一步發展的時期，為嶺南內部文化因素整合為夔紋陶時期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此外，在南沙鹿頸、東莞蠓崗、三水銀洲等遺址還發現了該時期的人骨材料，從中可以觀察到此時的人種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人種個頭比較大，並且都是仰身直肢葬，明顯不同於鹹頭嶺文化時期。

進入商文化時期，粵東地區發生巨變，尤其是浮濱文化的出現。浮濱文化與東莞村頭文化並行發展，並一直延續至商周之際。浮濱文化不僅在陶器技術上有所突破並變得更加成熟，而且在社會複雜化的進程上也較為先行。同時，浮濱文化在原始瓷製造上展現了高超的技藝，並朝著帶黃沁色的醬色釉方向發

展，這與浙江原始青瓷的發展方向有所區別。單就原始瓷技術而言，浮濱文化的源頭與橫嶺類型、虎頭埔文化存在直接聯繫。浮濱文化在等級和文明化程度上都比較高，其成熟階段與晚商殷墟時期相當。然而，原本在該地流行的幾何印紋陶卻無影無蹤了。^①

從商周之際開始，來自湖南的大寬沿甕、鼎以及粵東揭陽面頭嶺墓群 20 號墓出土的原始青瓷豆，均在博羅橫嶺山墓葬中有所發現。惠州博羅梅花墩窯址的燒造活動從西周中期開始，一直持續到春秋早期。它顯示出本地製造的夔紋陶和原始瓷相當繁榮，而且本地燒造的原始瓷可與浙江的原始瓷相媲美。此外，廣東也出土了同時期的禮器類青銅容器，如樂昌對面山墓地出土的與高砂脊一模一樣的銅鼎。由此可以推斷，自商周之際到西周早期或中期，廣東吸收了來自湖南的文化因素，同時保留了自身的原始瓷傳統，並向北輸出，雙方的交流頻繁。相比之下，此時廣東與長江下游的交流弱化。橫嶺山墓地的考古發現顯示，嶺南內部正在醞釀變局，以原始瓷、幾何印紋陶為主體，以方格紋和夔紋為組合的文化因素向西擴散到廣西東北部以及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區，向東則擴散到福建三明地區。與此同時，粵東的浮濱文化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進入西周之後，西周最核心的禮制影響了嶺南，博羅橫嶺山先秦墓葬群就是其中的代表。該墓葬群集中出土了編鐘等青銅重器。此外，嶺南還發現幾處西周晚期至春秋階段的窖藏青銅器，這些窖藏或在河邊，或在山頂，可能是當時越人先民舉行完祭祀儀式後把這些東西就地埋藏。雖然時人不像中原地區那樣埋葬成套的禮樂重器，但這的確是中原禮制影響下的產物，體現了兩周青銅禮制的地方化。

根據博羅橫嶺山和增城浮扶嶺的考古發現，可以推測珠江三角洲地區西周時期的高等級聚落中心或者城址很可能位於廣州東北方向的增城、博羅一帶。橫嶺山墓葬第一期出土器物的情況比較混雜，既有本地風格的器物，也有增城石灘圍嶺遺址風格的器物，還有浮濱文化風格的器物。^② 這表明增城、博羅一帶很可能是珠江三角洲早期文化和粵東浮濱文化的交匯地，這種交匯對後來在博

① 李岩：《廣東印紋陶及原始瓷發展脈絡》，載《從石峽到珠三角：中國南方史前先秦考古研究》，科學出版社，2020，第 275-299 頁；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浮濱攝英：廣東大埔、饒平原始瓷發現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②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博羅橫嶺山：商周時期墓地 2000 年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5。



雙耳夔紋陶罐

西周中晚期的陶器，器型較為規整，整體線條流暢，兼具實用性和美觀性。夔紋是商周時期常見的裝飾紋樣之一，多用於青銅器物上。以夔紋陶為典型特徵的文化因素是嶺南早期文明的重要代表。

· 廣東省博物館（廣州魯迅紀念館）藏

西周獸面紋青銅盃

1974年出土於廣東信宜，是廣東首次發現的西周青銅盃，通體飾夔紋、雷紋和饕餮紋，刻鏤精細，具有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風格，可能是周人贈予越人貴族的禮物，或是周人南遷所攜。它的出土為研究我國嶺南地區秦漢以前的歷史和文化提供了實物資料。

· 廣東省博物館（廣州魯迅紀念館）藏

